

# 壮士一去不复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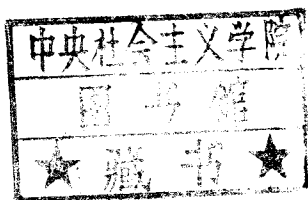


传记文学选  
江苏文艺出版社



I 253/55

68776



# 壮士一去不复还

■ 传记文学选

江苏文艺出版社

**壮士一去不复还**

——传记文学选（三）

朱明雄 编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100册

ISBN 7-5399-0007-5/I·5

---

统一书号：10141·1151 定价：2.15元

责任编辑 顾关荣

## 目 录

- 周恩来与邓颖超……………方铭 成也竟 郑淑芸(1)  
在最后的日子里  
——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同志……………高文谦(17)  
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裘之倬(26)  
彤彤报国心  
——海棠老人小记……………张欣 王长胜(76)  
壮士一去不复还……………戴善奎(92)  
家书抵万金  
——《傅雷家书》和傅聪……………叶永烈(111)  
霍英东的实业三部曲……………吴晓民(137)  
红鬃能上七十年  
——俞振飞纪事……………谷 苇(154)  
张蓉芳传……………刘耀辉(164)  
一个失败者的新生  
——记宋希濂……………汪东林(214)  
忆赵四小姐  
——朱洛筠谈张学良夫人赵一荻……………曹振中(308)  
后记……………朱明雄(317)

## 周恩来与邓颖超

方 铭 成也竟 郑淑芸

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在教育晚辈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说：“你们的终身大事应该由你们自己选择，自己决定。人们为了反对包办婚姻，要求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奋斗了几十年。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你们得到了这种权利，你们是幸福的。但也可以听听旁人的意见。”接着，他就讲了他同邓颖超定情的经过：“当我决定献身革命的时候，我就考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必须也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应该选择一个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作为伴侣，共同战斗。我是这样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的。接着，就和她通起信来了。我和你们七妈在共同的斗争中和长期的通信中，相互了解的基础是坚实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在一旁凝神谛听的邓颖超，这时两手一张，笑着插嘴说：“怪不得那会儿突然连连接到你的信呢！”

严肃的教诲，幽默的插话，真是相映成趣，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融洽与和谐。

邓颖超接着又补充说：“婚姻、恋爱应该由自己决定，但是不要一见倾心，就决定终身。一致的思想，共同的信仰，性情的融洽，个性的契合，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全面的了解，然后再确定关系，这样才能结成美满姻缘。”

他们的谈话，表达了他们的恋爱观。假如爱情真象诗人赞誉

的，是“一种相似的灵魂联盟”，那么，周恩来与邓颖超就是这样。他们一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坚韧不拔的毅力，惊人的胆识与才干，高尚的品德与情操，豁达大度的襟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正是这样一种高尚心灵的联盟，使他们的爱情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放出异彩，被人们誉为模范夫妻。

## 相 识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一九一九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这支女学生讲演队是天津爱国斗争中活动活跃、影响突出的一支宣传队伍。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报纸在周恩来主持下，立场鲜明，抨击时弊，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京、津、保等地声誉鹊起，日销最多时达二万余份。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马骏、谌志笃、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宣言》，举起了“革新”（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和“革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两面旗帜，表达了中国先进青年在十月革命启发下，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体现了“五四”时期革命青年“努力向‘觉悟’道上走”的进取精神。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相互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

没有心思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尤烈。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因此，他们为了斗争，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感情的闸门。

## 定 情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由沪启航。在四等舱里，坐着一百九十七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就有来自天津的周恩来、郭隆真、李福景等。他们是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留在国内的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友，则开始走向社会。邓颖超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

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却从未间断彼此的联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邓颖超把她们在国内组织“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成立“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创办《妇女日报》等战斗消息，不断写信告诉国外的社友；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旅欧中国少年党”的油印刊物《少年》、《赤旗》，也使邓颖超等国内社友耳目一新。特别是周恩来撰写的那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心得，对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国内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常使国内社友读后有顿开茅塞之感。

与此同时，国内社友还收到了由周恩来、郭隆真等编辑出版的油印刊物《觉邮》（即“觉悟社的邮箱”之意）。《觉邮》专登觉悟社社友彼此来往讨论问题的信件。受国外《觉邮》的启发，邓颖超等也在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上，出版了不定期的《觉邮》专刊。在国内《觉邮》专刊第一期上，便刊登着一九二三年一月周恩来给逸

豪（即邓颖超）的信，谈的是德法问题与革命。

觉悟社社友之间的通信，讨论的都是革命与斗争。但在信件之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他曾在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被害四周年之际，给社友寄来了他们两人的相片，并在信里联想到被军阀惨杀的社友黄正品（即黄爱）的“血祭”日子；他也曾在一九二二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虽然许多社友都曾收到过周恩来寄来的信与画片，但唯独邓颖超收到得最多、最频繁。据廖似光大姐说：“那是些漂亮的画片。邓大姐有一个相本哩！”一九八三年，邓颖超参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见到周恩来由法国寄给南开同学的明信片时也说，这样的明信片，她有一百多张。

觉悟社的社友在一次通信中曾高兴地写道：我们大部分社友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面了。确实，他们在共同追求、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了。而在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更由于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共同信仰与决心，使他们那种亲密的感情也逐渐成长了。他们就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定情的。

## 结 合

一九二四年七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九月，到达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和广东区委会常委兼军事部长，同时还担任着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东征后，他又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他的工作十分繁忙。

周恩来回国时，邓颖超仍在天津工作。她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一九二五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



妇女部长。

周恩来与邓颖超虽在书信往还中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几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据邓颖超自述，在他们这一时期的恋爱史上，还曾有过这样一段插曲：“一九二五年一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来看望我，因为，他是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他们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做了我和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又做了我得见高的介绍人。”

这一段小小的插曲，对于他们的结合，或许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年七月，邓颖超奉命调广州工作，由于南下途中在上海耽搁了一些日子，八月上旬才到广州。

当时，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工作更为紧张。邓颖超乘船到达广州的这一天，周恩来竟无论如何抽不出时间去接她，只得委托秘书陈赓作代表，拿了一张邓颖超的相片，去码头接人。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凭着照片认人，谈何容易，即便象陈赓这样的机灵人，看花了眼也没有找见邓颖超，只得回去向周恩来致歉。

邓颖超当然不知道周恩来的这个临时计划。当她踏上码头，在人群中左顾右盼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时，只得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住处去了。就这样，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在广州一间极其简朴的小房子里，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 别 高

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年代

和战争年代，可说是会少离多，屡经颠危。

在他们结合一年之后，一九二六年冬，周恩来便去了上海。次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国民党右派也在四月十五日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在上海、广州两地经受了白色恐怖的考验。周恩来和战友们一起组织了二十万工人参加的上海第三次总罢工，并和群众一起参加了抗议大屠杀的示威游行。邓颖超在“四·一五”大屠杀时却正因难产住在医院，也知道外边局势的变化。正不知如何应付的时候，幸亏共产党员陈铁军在自己刚逃出虎口的危急情况下，受党组织委派，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同沈卓清一起赶到医院，告诉了邓颖超这个紧急情况以及党组织要她立即离开广州的决定，又幸亏得到好心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仗义帮助，她和她妈妈二人才辗转到了上海。

但是，她同周恩来会面不久，五月下旬，周恩来便根据党的决定去了武汉。虽然六月间邓颖超也奉命调武汉工作，他们又得以短暂聚首，但七月间周恩来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去领导、指挥南昌起义。周恩来仅在要离开武汉之时，才简单地告诉邓颖超他将去九江，其他什么都没有讲。邓颖超也什么都没有问。他们自觉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即便在死别生离之际也是如此。

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别离，对周恩来与邓颖超象是家常事。在上海、在苏区，都是如此。在长征途中，他们也分别编在各自的队伍里。在到达黎平时，由于邓颖超肺病发作、大吐血，他们才得短暂的见面。之后，直到过草地前周恩来患了肝脓疡，昏迷不醒，邓颖超才守护在他身旁。

即便在解放之后，他们也常常不能团聚，特别是在周恩来为着共产主义事业，为着世界和平事业，履难历险的时刻。一九五

五年，在美蒋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之后，周恩来毅然决然出席万隆会议；一九五七年匈牙利事件时，周恩来访问了匈牙利；一九六四年正当加纳发生政变时，周恩来访问了加纳，都是冒着危险前去的。周恩来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而邓颖超则总是他革命工作的积极的支持者。

对这样频繁的分离，究竟要承担怎样的精神痛苦？邓颖超曾这样坦率地说过：“每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啊！”但共产党人是特种材料铸成的人，他们能正确对待这种动荡无常的家庭生活。正是为了广大人民大众能安居乐业，过和平幸福的家庭生活，他们才自觉地舍生忘死。

## 遥 念

战争环境、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他们的相互关怀、相互思念，在经常分处两地的情况下，显得格外动人。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已经神志昏迷，由聂荣臻、杨石魂（当时的汕头市委书记）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后来，他得知这位女同志的男朋友是个地下党员，远在湖南，便对她说：“只要你们相爱，总会找到的。”这话是对那位同志的慰藉，也表示着他自己执着的信念。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周

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倥偬之中，于中秋之夜仍抽暇给邓颖超写了一信，表达思念之情。这封信辗转托人送到邓颖超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和秘书楚平一起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楚平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邓颖超愉快地阅信后，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交给楚平。楚平指着“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落款处还特地写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他们夫妻之间，表达思念的方式，有时也十分独特。一九五四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这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一片原来压好的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回报亲人的问候，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这两地相思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永远是他们似海深情的见证。

## 恩 爱

在延安，领导和群众亲密无间，同志间相处真诚坦率。负责同志也往往散步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很随便地到各单位去串门。

有一次，周恩来、陈毅、李富春三人结伴踱到杨家岭的后沟去，那里是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妇委所在地。一到那里，便被一群女孩子包围了。一个女孩子开门见山地向周恩来问道：“周副主席，延安的同志们都说您和小超大姐是模范夫妻，你们是怎样恋爱的？”

周恩来饶有风趣地答道：“我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好多同志都配上对了。我啊，就扳了指头算，算啊算，算到了你们的小超大姐。”周恩来毫不掩饰的开头，使女孩子们更大胆了。她们又追问道：“您爱她什么？”周恩来就实实在在地讲了他的小超在爱国运动中冲锋在前的故事，也讲了他自己和其他战友被捕后，小超和其他同学一起营救他们的故事。

周恩来遇到的事，邓颖超也遇到过。在延安一次“三八”妇女节的座谈会上，中央妇委的女孩子起哄要邓大姐讲她的恋爱故事。邓大姐毫不忸怩地站起来背诵了一封周恩来给她的信。她背得那样纯熟，真令人惊讶。在这封信里，还有一首含蓄的诗呢！周恩来倾诉衷肠的信，在邓颖超心目中有着怎样的份量，也便由此可知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知极深，因而相爱也极深。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表现在相互之间无微不至的关怀上。

五十年代，邓颖超身体不好，而他俩的作息时间又不一致。每逢邓颖超在休息而周恩来要到卧室去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怕弄出声音惊醒了邓颖超。有时工作忙、安排不开，不能见到邓颖超时，也必让警卫员去告诉一声。

一九六〇年，邓颖超在协和医院（今首都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得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的情况。有一天，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道到医院弯了一弯。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关心，也同样细致而周到。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今日事、今日毕，而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又那么多，因此每每工作到深夜，经常通宵达旦。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全国城市人民有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为了保证北京人民春节有一顿

饺子吃，周恩来同有关同志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一位老同志说：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只有总理这样详细、周密地掌握情况的当家人，才有办法对付当时的困境。在那段时间，中央机关也取消了工作夜餐的规定。但每当同志们在周恩来那里工作到午夜还酣战不休时，邓颖超总是派人送上几块点心、一些糖果，或是一小盆素汤面，给大家增加些热量。当然，这些点心都是他们自己开销，因为那时为了同群众同甘共苦，周恩来已带头节衣缩食，停止了小灶。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都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本书垫一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了，从此他的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可用。周恩来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特别在他高龄、重病之后，更是不免感到劳累。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人们曾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见到过。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爱，首先表现在对他的理想、信念和工作的全身心的支持与关怀。这样的支持与关怀，倾注在生活中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上：吃饭时的交谈、休息时的散步、作为工作调剂的看戏……在两人工作都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们能这样见缝插针似地相互照应，相互安慰，是因为他们各自心里都有他（她）。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一九七四年夏才住进医院。在这一年半中，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的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在需要作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应该由邓颖超做的工作，或是她可

能做的工作，她一项也没有放过。每周两次的老同志学习会，她也从未缺席。对待疾病和生命，她同周恩来一样，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此，即便在最亲爱的人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着沉着与镇定。

周恩来与邓颖超共同生活了五十年。他们结婚时没有举行婚礼，后来也没有举行过什么纪念仪式。唯独的一次例外是在一九五〇年。

那天，著名导演孙维世兴冲冲地来到周恩来的住处，脸上带着几分诡秘的神色。中午时分，在她的鼓动下，卫士们把周恩来与邓颖超都请了来。孙维世宣布说：今天给爸爸妈妈举行结婚纪念仪式。接着她就活泼地把带来的两朵大红花分别佩戴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外衣上，又让小卫士们簇拥着他们到庭院中摄影留念。周恩来乐呵呵地说：维世给我们做银婚纪念了。邓颖超也高兴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今天倒戴了大红花，像个结婚的样子。看来，他们两人都清楚地记得这可纪念的日子，只是他们从不注重于纪念的形式罢了。事后，卫士们才知道，结婚二十五周年叫银婚，五十周年叫金婚，还有什么金刚钻婚等等。这张戴着大红花的照片，象征着他们夫妻的恩爱，犹如那永远鲜艳的红花。

## 家 庭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在和孩子们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象孩子。有时得知某个孩子和他们夭折的孩子是同年出生时，周恩来也会颇有感慨地和邓颖超说：我到上海参加领导三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你在广州难产，我们的孩子夭折了。我如果不离开广州，我们的孩子可能活下来了。在这种时候，邓颖超总是内疚地说：我不该背着你打掉第一胎。那时我才二十一岁，

年纪轻，看着广州革命形势好，你忙我也忙，就开了点中药打了胎。但这种父母思儿之情，一瞬就过去了。他们以父母慈爱之心，去关心、爱护革命的后代。所以，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顶不错！”

这十个孩子是谁？或者这数字只是一种泛指，可以不必考证，但他们抚养革命后代的故事，却早在革命队伍中流传。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孙维世独自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年龄太小，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为周恩来遇见。周恩来看到她哭得伤心，一经查问，才知道她是老战友孙炳文的女儿。于是马上把她带进办事处，端详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机灵孩子，连连叫着她的名字。不久，周恩来与邓颖超就派人把她送到延安，并写信给她的妈妈任锐，愿把这个孩子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此后，他们所给予孙维世的关怀，远比父母所能给与孩子的为多。

参加南昌起义的二十五师党代表李硕勋是在一九三一年被捕遇难的，烈士的夫人赵君陶（赵世炎胞妹）那时也带着孩子李鹏关在牢中。直到一九三九年，周恩来、邓颖超得知李鹏住在成都的亲戚家中后，才得以把他接到重庆，后又送到延安学习。从那以后，周恩来、邓颖超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他的学习、思想与生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李鹏被分配到前方工作，那时他已入党。当他去向“周伯伯、邓妈妈”告别时，周恩来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要思想上入党，才能象先烈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邓颖超也勉励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还送他一床延安出的毛毯，而他们自己床上摆的仍是两条洗得发白的普通战士用的旧棉被。一九八三年六月，



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邓颖超已八十高龄还专门到他办公室谆谆嘱咐：“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其他如蔡和森的孩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等，都是周恩来、邓颖超将他们找到并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始终给予关怀的。

不但革命烈士的子女，一切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小鬼，都曾感受过他们慈父慈母般的亲切关怀。

一九六三年一月梢，周恩来曾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并说这是“实现了八年前的愿望”。周恩来一边亲切地同周瘦老交谈，关心他的盆景园艺技术，也关心他的创作情况，鼓励他“写出好作品来！”一边抱起了周瘦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到此情此景，忽然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这是周恩来的胸襟，这也是邓颖超的胸襟，这也是他们共同的家庭观。

作为家庭，总有一些亲朋故旧，总有一些应酬，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不例外。他们对亲友在政治上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总是慷慨援助。周恩来一生公私分明，从不假公济私。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讲，他们自己的生活非常俭朴，家庭的经济支出，比较多的是用在以下四个方面：抚育培养烈士后代；补助有困难的同志；资助亲属；支付来开会同志（包括外地来的）的就餐费。邓颖超有一次说：“对恩来的家属，生活上有困难的，我们从经济上接济他们，最初占我们两人工资的三分之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解决，实际上增加了组织上的负担，我们自己解决了，就是替社会承担了一部分责任，恩来逝世后，我还负担着。”